

文化记忆场研究·系列一

冯亚琳 主编

德国文化记忆场

冯亚琳 选编

 中国言实出版社

四川外国语大学

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丛书之文化记忆场系列

重庆市社会科学规划特别委托项目成果(批准号:2012TBWT05)

四川外国语大学重大项目

本卷得到四川外国语大学德语系部分资助

文化记忆场研究·系列一

冯亚琳 主编

德国文化记忆场

冯亚琳 选编



中国言实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德国文化记忆场/冯亚琳选编. —北京:中国言实出版社,2016.8

(文化记忆场研究/冯亚琳主编)

ISBN 978-7-5171-1983-8

I. ①德… II. ①冯… III. ①文化研究—德国 IV. ①G151.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213031号

责任编辑:薛磊

出版发行 中国言实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朝阳区北苑路180号加利大厦5号楼105室

邮 编:100101

编辑部:北京市海淀区北太平庄路甲1号

邮 编:100088

电 话:64924853(总编室) 64924716(发行部)

网 址:www.zgyscbs.cn

E-mail:zgyscbs@263.net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京华虎彩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6年10月第1版 2016年10月第1次印刷

规 格 730毫米×1020毫米 1/16 22.25印张

字 数 375千字

定 价 56.00元 ISBN 978-7-5171-1983-8

总序

冯亚琳

无论是在西方还是东方,“记忆”在现今都是一个名副其实的热门话题,甚至可以说,它已经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个标志性现象。在前所未有的记忆热潮中,各种研讨会和论坛如火如荼,不仅冠以“集体记忆”或者“文化记忆”的记忆研究日益发展成为一门显学,而且催发了诸多跨学科、跨文化的应用型研究成果的产生,其中最有影响的是法国历史学家皮埃尔·诺拉(Pierre Nora)撰写的《记忆的场所》(*Les lieux de mémoire*, 1984—1992)。该书总共收入了130个代表某个“纪念场”的词条,并用散文形式对每一个词条作了阐释。诺拉的《记忆的场所》的出版在西方一度引发了强烈的连锁反应。继他的七卷本《纪念场所》之后,在西班牙、荷兰、意大利、以色列、俄罗斯先后都出版了类似的著作,2001年,由艾蒂安·弗朗索瓦(Etienne François)和哈根·舒尔茨(Hagen Schulze)主编的三卷本的《德国记忆场》(*Deutsche Erinnerungsorte*)在德国问世。书中总共列出121个对于德意志民族具有典型意义的“记忆场”。稍作梳理,就会发现,该书延续了诺拉的《记忆的场所》中遴选“记忆场”的思路,其中有历史事件诸如时任德国总理的勃兰特1970年12月7日在华沙英雄纪念碑前的“下跪”举动,有历史人物“俾斯麦”“罗莎·卢森堡”,有建筑物如“勃兰登堡门”、法兰克福“保尔教堂”,还有文学作品中的人物如“垃圾教授”以及主题概念如“责任”等。

那么,什么是诺拉所说的“记忆的场所”呢?

诺拉这样定义道:“记忆场首先是残余物,是最外部的形式,在这种形式的包裹下,一种铭记的意识存活在历史中,历史在召唤着它,因为历史不认识它。”〔1〕诺拉这里所指的,应该是所有一切能够唤起法国民族记忆意象的位点,其中包括“档案以及如蓝白红的国旗、图书馆、字典、博物馆,还有诸如纪念庆典、节日、万神庙、凯旋门、拉鲁斯字典以及巴黎公社社员墙”〔2〕等。

按照诺拉的观点,“记忆场”具有三个维度上的意义,即“物质的,象征性的和功

〔1〕 Pierre Nora, *Zwischen Geschichte und Gedächtnis*. Frankfurt a. M.: Fischer, 1998, s. 19.

〔2〕 Ebenda.

能的意义”〔1〕。

关于“记忆场”的物质性,诺拉写道:“被我们称之为记忆的东西,实际上是建立在所有我们回忆不起来的物质的基础之上的一个宏大的、令人眩晕的构造,是那些我们或许什么时候还应当回忆的事物无穷尽的目录。是莱布尼茨曾经提到过的‘纸质记忆’,是一个由博物馆、图书馆、储藏室、文献资料中心、数据库组成的独立自主的机构。”〔2〕这是一个含义广泛的定义。因为所谓的物质性在此并非仅仅指可以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比如默哀一分钟也可以视为一个时间单元的物质片段。

象征性是“记忆场”的第二个维度。因为,“即使一个显然是纯物质的场所如档案仓库也只是在象征的光芒环绕它的时候才能称其为一个记忆场”〔3〕,与此同时,“诸如一部教科书、一份遗嘱、一个战争老兵联谊会这样的一个纯功能性的场所也只能当它是一项仪式的对象时才能进入这一范畴”〔4〕。这也就是说,诺拉定义的“记忆场”的三种维度总是相辅相成,缺一不可。为此,诺拉特意举了一个抽象的记忆场,即“代”这个概念为例:“由于建立在人口统计学的内容基础之上,因此它具有物质性;功能性依据的是假设,因为它同时作用于回忆的结晶及其传承。从定义来看它却又是象征性的,因为它是根据仅有少数人参与过的一个事件或一个经历来描述多数人的特征的。”〔5〕

鉴于其作为位点的指向功能和与这一指向功能相关联的概念(或者说象征)意义,可以说,诺拉的“记忆场”概念与古希腊古罗马时期的以位点为导向的记忆术显然有着某种渊源。只不过,相比较,诺拉的“记忆场”的功能性具有普遍意义,也就是说,无论何种“记忆场”,它均具有唤起民族记忆的功能,正像诺拉所写的那样:“我的计划是,用一种深入进行的对‘场所’——这个词所有意义上的——的分析来替代一种普遍的、编年史的或者线性的研究。在这些场所中,法国民族的记忆以特别的程度得以浓缩、体现和结晶。”〔6〕

诺拉有关“记忆的场所”的论述与德国文化记忆理论奠基人、古埃及学者扬·阿斯曼和英美文学教授阿莱达·阿斯曼在他们的理论框架中提出的“记忆形象”概念有诸多交叉。

〔1〕 Pierre Nora, *Zwischen Geschichte und Gedächtnis*. Frankfurt a. M.: Fischer, 1998, s. 32.

〔2〕 Ebenda, s. 22—23.

〔3〕 Ebenda, s. 32.

〔4〕 Ebenda.

〔5〕 Ebenda.

〔6〕 Pierre Nora, *Zwischen Geschichte und Gedächtnis* a. a. O., s. 7.

与诺拉强调“记忆场”是现时与历史相遇的“场所”相似,扬·阿斯曼提出“记忆形象”(Erinnerungsfiguren)概念也是为了描述记忆的过程。阿斯曼指出,思想是一个抽象的过程,与之不同,记忆却是具体的。这也就是说,记忆建立在概念与图像融合的双重基础之上。对于这种由概念与经验共同作用下产生的东西,哈布瓦赫曾用“记忆图像”(Erinnerungsbilder)来指称。阿斯曼将其与他的“记忆形象”进行了区分:“我们理解的‘记忆形象’是文化构建的、具有社会约束力的‘记忆图像’,之所以选择了‘形象’(Figur)来替代‘图像’(Bild),是因为它不仅与图像构成,而且与叙述构成相关。”〔1〕

扬·阿斯曼也用了三个特征来定义他的“记忆形象”概念,即时空关系、群体关联和重构性。

关于“记忆形象”与空间和时间的关系,阿斯曼指出:“记忆形象要求通过一定的空间来物质化,并在一定时间内现时化,因而在空间和时间上总是具体的,尽管并非总是地理和历史意义上的。”〔2〕年复一年的各种节庆,无论是教会节日、市民节日还是军队节日,都体现出某一个群体共同“经历”的时间;空间记忆框架对于某个人群的意义充分体现在“家乡”这个词中。曾经居住过的房子对于一个家庭与某个村庄和山谷对于农民、一个城市对于市民意味着什么并无二样。此外,“属于空间的还有环绕在‘我’周围、属于他的物体世界”〔3〕,这一包括仪器、家具及其特殊排列秩序的物质世界是人自身的支撑与载体。记忆有空间化的倾向,不仅如此,“群体与空间结成一种象征性的本质共同体”〔4〕,如果某个群体丧失了对他们意义重大的空间,那么它就会转换成为这个群体全体民众的圣地,正像哈布瓦赫在他的《福音书中圣地的传奇地形学》所描述的那样。

“记忆形象”的群体关联特征的出发点是:“集体记忆附着于其载体身上,不能随意转移。”〔5〕集体记忆的每一个参与者都有自己的所属性,都有具体的身份认同。也就是说,集体记忆的时空概念与相应团体的交往形式处于一种共生关系中,它既有感情意义,更有价值意义。“记忆形象”不仅显现为对于一个群体的自身形象和目标富有意义的“家园”和“生活史”,它不仅重构群体的过去,更为重要的是,它也定义群体

〔1〕 Jan Assmann, *Das kulturelle Gedächtnis. Schrift, Erinnerung und politische Identität in frühen Hochkulturen*, 3. Auflage, München: C. H. Beck, 2005, s. 38.

〔2〕 Ebenda.

〔3〕 Ebenda, s. 39.

〔4〕 Ebenda.

〔5〕 Ebenda.

的本质、特性和弱点。

与群体关联特征密切相关的是“记忆形象”的重构性。这指的是,任何一个社会的过去都不会是记忆中的现成的事实,而是社会在不同关联中的一种重新建构:“就是说,记忆以重构的形式进行。过去在记忆中不可能作为过去本身被保留。它不断被重新组织,其出发点即是随着向前推进的现在而一直处于变化之中的关联。即使新的东西也只能以重新建构的形式出现。”〔1〕

由于“记忆形象”凝聚了相关历史文化语境,因此它具有促使记忆形成的功能。换句话说,“记忆形象”被调动的过程就是记忆本身开始的过程。阿斯曼认为,促使记忆发生的“记忆形象”有可能源自于“神话、歌曲、舞蹈、谚语、法律、经文、图像、装饰图案、绘画和路径”,对于澳大利亚人来说甚至包括“整个风景”,〔2〕甚至还可以扩展到“流行语、概念、名称、口号、引文、噪音、歌曲、旋律、气味、触觉和味觉印象以及一般的身体感觉、情感状态和身体姿势”等。〔3〕

比较诺拉的“记忆的场所”和阿斯曼提出的“记忆形象”的概念,可以发现,两个概念中都凝聚了对于群体的身份构建具有关键意义的事件,它可以是某个场地、某个人物、某个事件,甚至某个图像、某本书籍,等等。它“以压缩的方式保存大量的文化信息,其中包含着群体共同的价值体系和行为准则”〔4〕,其核心在于它的象征能量。诺拉的“记忆的场所”与阿斯曼的“记忆形象”之间的区别则在于,“记忆形象”是阿斯曼文化记忆理论构想的一部分,与之密切相关的是存储记忆的空间倾向与功能记忆的时间关联〔5〕。正是在这样的关联中,“文化”的核心质量和它与记忆之间的密

〔1〕 Jan Assmann, *Das kulturelle Gedächtnis. Schrift, Erinnerung und politische Identität in frühen Hochkulturen*, 3. Auflage, München: C. H. Beck, 2005, s. 41.

〔2〕 Ebenda, s. 89.

〔3〕 Sabine Jambon, *Moos, Störfall und abruptes Ende. Literarische Ikonographie der erzählenden Umweltliteratur und das "Bild" gedächtnis der Ökologiebewegung*, Diss. Düsseldorf, 1999, s. 90.

〔4〕 康澄:《象征与文化记忆》,载《外国文学》2008年第1期,第55页。

〔5〕 在《记忆空间——文化记忆的形式与变迁》一书中,她首先提出了记忆“作为 ars”和“作为 vis”的概念(阿斯曼在另一处又称 ars 为“人工记忆”,称 vis 为“自然记忆”)。在追述了欧洲记忆术久远的历史之后,阿莱达·阿斯曼指出,记忆作为“ars”以存储为目的,可以将其设想成为一种“存放”(Einlagerung)和“取出”(Rückholung)的过程。正像古代记忆术所证明的那样,这一“存储”过程并不依赖物质,而是“人类记忆的特殊功能”。这一点,尤其表现在对知识诸如数学公式、诗歌、历史事件等的背诵上。与“作为 ars”的记忆的空间关联不同,“vis”的主导关联是时间,指称的是“回忆行为”。换言之,“存储”视时间为障碍并以克服时间为目的,而“回忆行为”则发生时间当中。正是由于时间对于回忆过程的积极参与,产生了一种“存放”与“取回”的“根本性移位”。阿莱达·阿斯曼将文化记忆划分为功能记忆和存储记忆两种不同的记忆形式。她称前者为“被居住”的记忆(das bewohnte Gedächtnis),后者为“未被居住”的记忆(das unbewohnte Gedächtnis),两者之间的最大区别建立在它们各自与当下的关系上。“存储记忆”与当下没有直接的关联,而“功能记忆”则以当下为出发点。

切关系得以体现。因为在阿斯曼那里,文化不仅具有共时维度,而且也具有历时维度。在共时维度中,文化能够完成“协调”任务,使得文化的参与者的相互交往、进而使得“社会”成为可能,而文化的历时性维度则为文化的持续性创造了条件,也就是说,“文化的功效并不仅仅在于使人们能够利用符号,在某种程度上相互信任地交流,在较大的联盟中共处并共同行动。文化也为如下这种情况提供了条件:不是每一个个体和每一代人均需从头开始。”〔1〕有关文化的共时性和历时性维度的论述不仅为阿斯曼夫妇有关交际记忆和文化记忆形式的划分奠定了基础,更为重要的是,它从根本上将文化和记忆联系到了一起。

正是基于上述考虑,我们用“文化记忆场”这一概念代替诺拉的“记忆的场所”作为本套丛书的书名,目的是用阿斯曼夫妇关于“文化记忆”的理论构想补充和丰富诺拉的“记忆场”,在关注空间性的同时凸显时间性,在强调群体关联的同时重视重构性,关注文化与记忆的密切关系,借助“过去留下的物质遗迹、仪式、经文和传统”〔2〕等反思历史,重构过去,充分发挥记忆释放过程的创造性和反思性功能,把每一个文化记忆场——无论它是物质的、社会的还是精神的——都视为“能在集体层面与过去和民族身份联系起来的”〔3〕处于变迁和张力之中的文化现象,而这些文化现象不仅是一个民族记忆的对象,更是建构集体同一性的反思的对象。

2014年10月于重庆

〔1〕 Aleida Assmann / Jan Assmann: *Das Gestern im Heute. Medien und soziales Gedächtnis*, in: Klaus Merten, Siegfried J. Schmidt, Siegfried Weischenberg (Hrg.): *Die Wirklichkeit der Medien. Eine Einführung in die Kommunikationswissenschaft*, Opladen; Westdeutscher Verlag, 1994, s. 115.

〔2〕 莫里斯·哈布瓦赫:《论集体记忆》,毕然、郭金华译,上海人民出版社(世纪出版集团)2002年版,第200页。

〔3〕 阿斯特莉特·埃尔:《什么是文化记忆研究?》,饶佩琳译,载《中外文化》第一卷,冯亚琳、张法、张旭春主编,重庆出版社2010年版,第72页。

目 录

尼伯龙根之歌	彼得·瓦普内夫斯基	1
勃兰登堡门	古斯塔夫·赛布特	11
魏玛	格奥尔格·博伦贝克	26
纪念碑	克劳斯·诺依曼	46
容克	海因茨·赖夫	60
圣诞节	多莉丝·福伊齐克	76
罗蕾莱	卡佳·察诺维斯基	90
歌德	狄特·博西迈尔	106
席勒	奥托·丹	125
洪堡兄弟	鲁道夫·菲尔豪斯	140
卡斯帕·大卫·弗里德里希	维尔纳·布施	154
海因里希·海涅	迈克尔·维尔纳	168
台奥多尔·冯塔纳	歌特哈德·艾尔勒	184
尼采	斯蒂文·阿西海姆	199
里夏德·瓦格纳	赫弗里德·明克勒	214
曼氏家族	伊尔梅娜·冯·德尔·吕尔	231
腓特烈大帝	弗兰克·洛塔尔·克罗尔	247
格林童话	玛利亚·塔塔尔	260
华沙之跪	亚当·克泽明斯基	274
包豪斯	安雅·鲍姆豪弗	288
杜登	乌韦·普施勒	303
安定与秩序	托马斯·林登伯格	318
知识就是权力	克劳斯·藤菲尔德	332
编后记		346

尼伯龙根之歌^[1]

彼得·瓦普内夫斯基^[2] 著

胡蓉 译 陈瑾 校

一

光辉照人的齐格弗里德,强悍的布伦希尔德,懦弱的机会主义者贡特尔,阴险的凶手和叛徒哈根——英雄史诗蜕变成了模式,世界文学败落为仅有一堆引文的陈词滥调。余下的还有尼伯龙根的忠诚。

《尼伯龙根之歌》与其他伟大的文学作品一样,都有着相同的命运:常常被人提起并备受赞美,但很少被人了解与熟读。在热情洋溢和充满民族骄傲的年代,人们将这首史诗称作“德国的伊利亚特”。假如看到并记住两者间最根本的区别,那给它贴上这样的标签也不为过,因为两部史诗都是通过诗歌反映漫长的、延续了数百年的历史进程;虽然两部史诗在表述上或许显得非常古朴,但在艺术上均属于晚期成果。两部史诗都是反映了某种历史观点,它们都以神话和传说的形式重新构建了历史事件——或者说:在神话的记忆中加入了历史事件。这些文学创作不断流传、延续、补充、相互联系,然后在一个特定的时间形成最后的有效形态。

二

就《尼伯龙根之歌》而言,人们不知道是通过谁留传下来的,但是人们可以重构它的形成阶段:

古老的传说给我们讲述了很多不可思议的东西,

[1] Peter Wewski, *Das Nibelungenlied*. In: Hagen Schulze / Etienne Francois (Hrsg.), *Deutsche Erinnerungsorte*. (I. München; C. H. Beck oHG 2001. s. 159—169).

[2] 彼得·瓦普内夫斯基(Peter Wapnewiski, 1922—),日耳曼文学专业退休教授,柏林科研究院的研究员。著有《你知道这将会……? 理查德·瓦格纳尼伯龙根指环》《中世纪的德国文学》等。——译注

值得颂扬的英雄,艰苦的战争……

在这第一部分的长句诗节中,每四个押尾韵的句子组成一段,在口头吟诵时需要想象为狂想曲旋律的宣叙调——尼伯龙根之歌以此吟唱着历史精神。这“古老的传说”深深植根于开启中世纪所谓的民族大迁徙时代的争论中,此外还反映了梅洛林王朝内部的权力斗争。有一个日期确定了相对坚实的立足点:437年,一支由阿提乌斯德带领的罗马雇佣军在匈奴人的帮助下击败了勃艮第人和他们的国王,将其位于莱茵中部沃尔姆斯周围的王国向西——即罗马统治区高卢一带扩张。现在如何用历史的阐述来解释一个非常强大的王国及其国王的没落呢?是神话,是神话的逻辑,寻求一个具有启发性的主题:整个民族灾难性的毁灭的起因必定是“复仇性的惩罚”,一个针对背叛的惩罚。那么是什么样的背叛呢?如今构成灭亡的重要前因的,是一部关于爱情、妒忌、权力和谋杀的传奇故事,即“齐格弗里德和布伦希尔德的传奇故事”,它与传说的第二部“勃艮第民族的灭亡”原本并无关系,但现在其作用被利用起来。

将这两部分连接在一起的关键是对一位英雄的谋杀。但是神话的逻辑是怎样解释这位光芒四射的少年英雄被谋杀的呢?是背叛。就是说,齐格弗里德的生与死通过复仇的必然过程和勃艮第人的生与死联系在了一起。在那次通过谋杀叛变占有了巨大的财富之后,勃艮第人就背负了“尼伯龙根”这个名字,这笔财富被它最初的主人称作“尼伯龙根宝藏”并被齐格弗里德所获得。

然而为什么要谋杀这位光辉照人的少年英雄呢?是对金钱的贪婪和对权力的欲望,这成了这段英雄被刺杀情节最古老也是最原本的“动机”。到了后来(约10世纪、11世纪和12世纪),这一情节在进一步的编写创作中得以提炼,在整体中编织出心理和道德影响方式的精准关系,并将其融入已有的故事中——并不总是靠运气,也并非只注意清晰度和逻辑关系。但是,只要记载古老传说的岩石一层层逐渐显露出来,只要摒弃和重叠的部分与事件的进展表现出干扰性以及“非逻辑性”的对立,就会发现,那个被我们称之为最后的、也是原本的作者,那个我们对其创作原稿一无所知的人,以吸引人的方式或以轻微的柔情成功地创造出能与世界文学最伟大功绩相提并论的充满风暴和寂静的作品。

三

约1200年前后,当(最后的)作者在多瑙地区从事他的工作时,政治局势混乱不

堪并充满了灾难性。1190年第三次十字军东征,弗里德里希一世巴尔巴罗萨(Friedrich I. Barbarossa)在萨勒芬河(Saleph)沐浴时溺死。1197年,他强大而残暴的儿子海因里希六世(Heinrich VI.)意外身亡。王国的根基动摇了,施瓦本(Schwaben)^[1]的菲利普(Philipp)(施陶芬党派)和布伦斯维克(Braunschweig)^[2]的奥托(Otto)(威尔芬党派)自立为王,相互争斗并发生了战争;权力的欲望、野心、背叛、谋杀和死亡决定了政治事件的发生,并成为一场波及当时整个欧洲的地震。瓦尔特·冯·福格尔瓦德(Walther von der Vogelweide)为那个时期(约1200年)这样叹息:“到处都充斥着暴力。”《尼伯龙根之歌》让那些希望得到规劝的人了解到,一场冲突如何由少数人引起,人与人之间的仇恨和貌似正义的复仇怎样如燎原之火一般蔓延开来,以及它最后又如何在大规模杀戮造成的混乱中结束。不言而喻的是(即使复仇也能称得上正义),此类事件在任何时候都令人吃惊地极具现实意义。

“尼伯龙根”戏剧中的角色们尽管部分被神化,但都是些非常有人性的人:齐格弗里德是健壮的英雄,英俊而愚蠢;布伦希尔德骄傲且自命不凡,容易动气;克里姆希尔德很仁慈,甚至天真无邪,后来却变得冷酷而工于心计,最后更是成了无情的充满仇恨的复仇工具;贡特尔是一位摇摆不定的策略家,而哈根则是出于臣属原则的野蛮的权力政治家。他们全都在自己不曾希望的、但具有挑衅性的、可怕的命运灾难中超越了自我,没有谁不是在命中注定要自负责任的毁灭的血海和火海中背弃了自己原本的人性——只有被新时代可想而知的悲剧性冲突毁掉的贝希拉恩(Bechelaren)^[3]的边境总督吕迪格尔是一个例外。

四

《尼伯龙根之歌》之所以被确定为“德意志民族史诗”,是德国人在拿破仑独裁统治的压力下,为寻找一件能促进民族身份构建的艺术品的结果。他们恰好在“德国的伊利亚特”中找到了想要的东西。颂扬尼伯龙根和将其偶像化的“德意志”纲领在所有尼伯龙根最初的版本中表现出来。它出自来自哈根的弗里德里希·海因里希,如同所有柏林人一样,他来自布雷斯劳(Breslau)^[4],曾是法学家,值得一提的,他拥

[1] 德国地名。——译注

[2] 德国地名。——译注

[3] 德国地名。——译注

[4] 地名,现属波兰。——译注

有第一个(1810年成立的弗里德里希—威廉大学的)日耳曼学教席。在前言中,他这样写道:“现如今,在这撕碎一切的风暴中,对这门语言和对我们尊敬的祖先留下的作品的热爱在德国表现得积极而活跃,好像人们在过去和创作中寻找当代正令人痛心消失掉的东西。这种让人感到慰藉的努力也正是不可灭绝的超越一切从属关系并迟早会打破各种外来枷锁(这当然是指拿破仑的威胁——本文作者)的德意志特性,并由此重获其天性与自由。”这样的语气一直继续下去,必然地融入到了德意志的尼伯龙根道德中:“在狂暴的热情、复仇与愤怒的阴暗威力以及可怕的死亡乐趣的交织中显得更加耀眼且多种多样的优点,虽然悲苦,但仍给予我们安慰并使我们振作,让我们向不可避免的力量屈服,让我们有勇气发表言论、采取行动,让我们对祖国和人民感到骄傲与信任,让我们对德国的荣誉及世界地位有朝一日的回归满怀希望。”〔1〕

关于哈根就说到这里。一个卓越的具有时代特色的见证是1807年,取笑它是不恰当,且有悖于合理的历史研究精神的。必须在那个时代的准则中对它进行合理的理解:在那个时代中,一种德意志爱国情绪衷心希望的不外乎是从“陌生枷锁的束缚”中得到解放。但是《尼伯龙根之歌》在随后的一段时间中还是被无情地进行了民族意识的阐释。这种工具化在一个半世纪后仍然没有消减。直到对《尼伯龙根之歌》的接受与影响在思想意识批判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的克劳斯·冯·西(Klaus von See)这样说道:“由于从1815年以来拿破仑时期的战争热忱不再符合时代要求,下面的问题就显得更加急迫:为什么一部史诗能成为民族意识形态的组成部分,而它原本与德意志的历史毫无关系,只是事关勃艮第王室的纠纷与谋杀……”相反,黑格尔在他的《美学》(1818/1820)一书中具有洞察力的思考给人以更加深刻的印象:“在尼伯龙根之歌中,虽然我们从地理意义上来说位于本国的土地上,但是勃艮第人和国王埃策尔与我们目前的教育及其祖国的利益都没有任何联系,我们只是在没有荷马诗作丰富学识的情况下感受到家乡般的气息。”〔2〕

黑格尔的评论清楚地表明:除了政治思想意识上的接受外,这种接受是通过年号奏响的,是对古代叙事诗的进攻行动,发现及宣传一种民族的识别模式,并在尼伯龙

〔1〕 Zit. n. Joachim Heinze; *Das Nibelungenlied*. München/Zürich 1987, s. 99f. Auch in: *Die Nibelungen. Ein deutscher Wahn, ein deutscher Alptraum. Studien und Dokumente zur Rezeption des Nibelungenstoffs im 19. und 20. Jh.*, hrsg. v. Joachim Heinze und Anneliese Waldschmidt, Frankfurt/M. 1991, s. 141f.

〔2〕 Klaus von See; *Das Nibelungenlied—ein Nationalepos?* In: *Die Nibelungen*, s. 43—110, hier s. 59f.; *das erstaunliche Hegelzitat ebenda*, s. 60.

根忠诚中达到顶峰。还有另外一条线,它始于施莱格尔、歌德、黑格尔、格维努斯,然后延伸至黑贝尔、理查德·瓦格纳和托马斯·曼,这便是美学神话的阐释传统。

五

让我们回过头再来问问:这首史诗究竟写的是什么样的内容?克劳斯·冯·西总结到:“一部费解而尴尬的欺骗喜剧,由于主角放纵的或者也许只是愚蠢的饶舌而发展成了一部婚姻悲剧,然后在一个遥远的东方蛮族的王宫里,被谋杀者的妻子借助在一旁观看而无所行动的第二任丈夫的权力,实施了长期以来的复仇计划,制造了骇人听闻的血腥结局。”尽管如此:除了这首诗中本来一目了然的道德层面的,且并不属于德意志历史的基本特征(我们今天称之为结构)以外,它在政治思想传统路线上一直披着道德的外衣,主要借助“尼伯龙根之忠诚”这一显得草率的政治关键词,受到热情的甚至是狂热的利用。关于这一点,我们首先要感谢帝国首相比洛(Bülow)公爵,他曾在1909年3月19日,也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五年半时,在帝国议会的发言中这样说道:“先生们,我在某处看到一些关于我们从属于奥匈帝国的讥讽的言论。这些言论很愚蠢。这里不存在如同《尼伯龙根之歌》中两位王后之间关于先行权那样的争论。但是我们不打算将尼伯龙根忠诚从我们与奥匈帝国的关系中排除,相反地,我们要保持它。”〔1〕五年半之后,(即1914年8月),德国的教授、作家以及政治家们向奥匈帝国(按道德主义的、理想主义的或者混乱的、迷惘的方式)开始宣扬德意志帝国对奥匈帝国的尼伯龙根之忠诚。他们不知道,他们毫不知情地提出了怎样的一个预言。我多次引用过一位(名叫奥托·科赫的)德国教育工作者的话:“为了让对尼伯龙根之歌的兴趣再次活跃在中学七年级,老师要指出,在1813年德国大学生们将尼伯龙根之歌如同圣经般放进书包带到野外,在篝火边以德国古代的这些英雄形象来激励自己做出伟大的业绩,以这种方法适当地唤起这些年轻人的民族感情。”〔2〕

这样,这首史诗被1917年即将成为最后一批入伍参加战争的中学七年级学生用来激发英勇的行为,更不用说它与1813年自愿入伍的年轻人之间可疑的联系。

对“尼伯龙根之忠诚”思考到最后,我们听见了帝国首相比洛公爵的接班人特奥

〔1〕 Zit. n. Herfried Münkler/Wolfgang Storch: *Sieffrieden. Politik mit einem deutschen Mythos*. Berlin 1988, s. 70.

〔2〕 Zit. n. ebenda, s. 56.

巴茨·冯·贝特曼-赫尔维克(Theobalds von Bethmann-Hollweg)值得再三思考的一席话。他对于无条件支持奥匈帝国对塞尔维亚的军事制裁政策所作的思考晚了点,甚至有点太晚了。在1914年7月30日,离12点还有半秒时他给驻维也纳德国大使馆的格拉芬·切尔施基(Grafen Tschirschky)拍了电报(这也许证明了他聪明的判断力,但实在是太晚了而没有得以实施):“我们虽然愿意履行我们的联盟义务,但坚决反对轻率地且不考虑我们建议地将我们卷入这把世界战火中。”〔1〕

六

第一次世界大战这把世界战火持续燃烧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尼伯龙根之歌》一直伴随在一旁,并被贴上各种标签:“民族教育的王室财产”“德意志道德著作”“日耳曼德意志本性的觉醒”“英雄宿命论”“德意志英雄忠诚的颂歌”。所有崇高的美德都给了勃艮第-尼伯龙根,而埃策尔的匈奴人自然被划归为下等人(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弗里茨·朗根据特娅·冯·哈堡1924年的剧本而拍摄的由两部分组成的戏剧艺术的表现主义电影作品中)。

民族好战神话化的巅峰最终在1943年让斯大林格勒成了俄国战争中决定性的事件。“和蔼的杀人犯”(托马斯·曼语)戈林在1943年1月30日、即所谓夺取政权的第十个周年纪念日上发表的可怖的演说对此带有极大的讽刺:一支部队在冰雪与血泊中战死、冻死、饿死、流血过多而死,幸免于难者并不是真正的解脱,而是将作为战俘受到折磨。所有这些都是因为曾经是二等兵的阿道夫·希特勒拒绝了司令员、陆军元帅保卢斯(Paulus)无奈之下做出的撤退的命令。如果人们想知道的话,在1943年1月30日这天就可以知道这场战役战败的结局;但是戈林当时竟敢在他位于柏林的安全堡垒中通过广播发表讲话(这也是残暴的人无可奈何的花言巧语):“谁现在在战场为了一草一木,为了每个洞穴、每条战壕而与强大的优势对手抗争,不断地战斗,疲惫,精疲力竭,——我们有一首关于独一无二的战争的非常英勇的史诗,叫作‘尼伯龙根之战’。他们挺立在燃烧着熊熊火焰的大厅中,用自己的血液解渴,但一直战斗到最后一刻。这样的战争现在正激烈地进行着,每个德国人还会在今后若干年中带着虔诚敬畏的心情说出斯大林格勒这个词并回忆起,德国最终还是在那儿

〔1〕 Zit. n. ebenda, s. 73.

取得了最后的胜利!”〔1〕三天之后,1943年的2月2日,第6军的残余力量投降:约15万人阵亡,约10万人被俘虏(而戈林就是那个要负责为被封锁的部队提供空中供给的人……)

七

再来回过头来看一下我们神话中的英雄们。仔细观察齐格弗里德这位英雄光辉的形象,他在经历了几个世纪后留下了什么让人钦佩并被偶像化(同样也在造型艺术中)的东西?这个齐格弗里德,他首先是一个可怜的叛徒。他背叛了《尼伯龙根之歌》中最纯洁的女人——布伦希尔德。他对她的背叛表现在:其一,在打赌时有意让不诚实的贡特尔在通过隐身帽而藏身的协助者的帮助下获胜;第二项可耻的欺骗行为发生在贡特尔的婚床上,齐格弗里德同样是蓄意而为,同样是在隐身衣的帮助下,再一次战胜了布伦希尔德。(布伦希尔德,我们不用把她想象成浑身肌肉的强壮女人;确切地说是她的贞洁,她的不可触摸,她的光芒,使她显得强大,显得不可战胜。)这是为了让这个精疲力竭的人完成与贡特尔的婚姻。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当然,一个男人不顾一切想要通过考验的兴趣起了重要的作用——但最重要的,这是一场交易。他想要并且得到了作为回礼的贡特尔的妹妹克里姆希尔德。

他被杀害是一场可怕的暗杀行动。因为这场行动是如此的阴险卑劣,从而导致这位被谋杀的英雄最终被神化。尤其在与1918年所谓的“背后一箭”传说的关系中可在圣像学研究中当作姿势图像。这样一次令人厌恶的卑鄙行为,用下面的论据来为这种谋杀行为的技巧做出合理的、符合逻辑的辩解是毫无意义的:除了从背后阴险地下手外还有什么办法杀死他呢?他有使自己不受伤害的肌肤,除了仅有的菩提树叶大小的一块能被伤到的地方——也就是说他只有通过阴险的方法被杀死。但是这种考虑是愚蠢而狭隘的算计,因为他坚硬的肌肤反映了我们在《伊利亚特》中从阿喀琉斯的脚踵处所理解到的“有限的无法伤害”原则。这种神话般的盔甲正是以比喻的手法表现出不可侵犯的(但是并不完美的)英雄的力量。起决定作用的不是技巧,而是谋杀这个事实。

〔1〕 Peter Krüger: *Etzels Halle und Stalingrad. Die Rede Görings vom 30. I. 1943*, in: *Die Nibelungen*, s. 151ff., hier s. 153, sowie s. 383f.

八

最后要提出的关于《尼伯龙根之歌》的时代性、当前性、历史性、现实性、相似性以及“变化性”的问题。在事件发生及行为方式中我们发现了一些人类学的常数,另一方面我们惊奇地、不太理解地偶然发现了陌生的、让人惊异的东西。

这些常数中包含了欲望的政治动机,或者说是对金钱的贪婪,也可以说是对权势的贪欲,还有一些其他的属于人的内心及精神层面的人类学常数,比如: *liebe mit leide ze jungest löhnen mac*: 即爱情均以幸福、痴迷和诱骗开始——可能以绝望和痛苦结束。另一方面是我们感到陌生的东西,即封地概念和由封地概念以及从仆关系引出的行为(哈根的形象和作用)。对我们来说陌生的是如“护送者”,即起保护和引导作用的陪同;有约束力的“捐赠”的意义(如同吕迪格尔的形象中保存下来的那样)。(与封地教育相对的)中世纪的社会秩序对于我们来说也完全是陌生且不可重演的。在诺塔·维吉利(*Rota Vergilii*)的中世纪图像中展现出的社会秩序被理解为符合上帝意愿的等级界限。这种以宗教为基础的信念起到了巩固社会等级制度的作用,并使统治者有可能在他们的城堡中建立等级制度。因为违背和废除等级制度是与上帝的法则相悖的。

九

最后再说一下作家的特有成就以及使尼伯龙根的作者在中世纪作家中无与伦比的原因。他带着全身心奉献的精神致力于那些让他有机会展现宫廷豪华的场景、摆设、装饰、服饰、马车装备、庆典、竞赛——这些让他心跳,此外他也不会忽略掉使得庆典蓬荜生辉的乐手们的功劳——他们毫无疑问也应该得到这样的报酬。他们与他很亲近,尽管他思想上接受过学校的教育,在某种程度上并不是简单的娱乐艺术家。当他在克里姆希尔德与齐格弗里德的恋爱情节高潮中发现他们丰富的内心世界时,很显然并不仅仅是这样的舞台场景和舞台道具的展现引起了他的兴趣。正是这些场景清楚地表明,那些我们称之为氛围或光芒的东西,他是如何用描绘的力量,以及以怎样简约的手法来做到的,虽然他和1200年左右宫廷时代的其他伟大诗人不无共同之处。